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对外汉语教研 论丛

D U I W A I

H A N Y U

J I A O Y A N

L U N C O N 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

本辑顾问 潘文国

主编 吴碧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吴碧莲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7-5617-2126-9

I. 对… II. 吴…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984 号

责任编辑 范剑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

主编 吴碧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500 本

ISBN 7-5617-2126-9/H·142

定价 12.00 元

序

王铁仙

我校对外汉语的教学有很长的历史。我们从六十年代中期即开始招收外国学生教授基础汉语,当时的学生主要来自越南。“文革”时期自然中断,而新时期开始后很快就恢复了,并专门建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中心”这样一个教学和科研实体,来承担这项任务,迄今已持续二十余年。招收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相当多,尤其是近几年来,与日俱增,每年有 500 名左右,并且来自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1994 年,我校又与其他三所高校一起,作为试点,面向本国学生设置了对外汉语的本科专业,并获得成功。这个本科专业的教师同时也参与一些留学生方面的汉语教学。这本书里的论文作者,主要就是这两个单位的教师。

长期的教学实践,必然能够引发科研的兴趣,并且获得真知。何况我们所有老师的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严谨,他们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的特点,摸索、揣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少老师本来还是汉语文字学方面的学养深厚的专家。因而多年来,他们在不少刊物和研讨会上发表关于对外汉语的论文,得到好评。他们和国内的同行们一起,证明了“对外汉语”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的特点、规律和要求,并不是面向国人的现代汉语可以完全取代的,它在学术研究上大有可为。此外,鉴于外国留学生大都想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因而如何结合汉语教学进行中国文化的介绍、传播,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他们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这里结集的论文,只是他们的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形成更浓厚的研究的风气,并能得到兄弟学校和科研单位同行们的批评,进一步

提高我校这一领域科研成果的质量。

我校是一所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教师队伍应该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深入的学科教学的研究,以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作出较大的贡献。不但对于国内学生是如此,对于国外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志向。我个人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外行,但我在这本书里感受到这种志向,看到了很好的成绩,因而感到高兴,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目 录

序

王铁仙

潘文国·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兼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设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王 珏·抽象名词的语法分类及其语法特征 (13)

朱 虹·普通话影响下的上海方言词汇初探 (25)

陈流芳 曲卫国·也谈“比”字句否定式的含义 (36)

姜晓虹·论现代汉语比较句中的“要”字 (47)

傅 源·浅析趋向补语“下”的语义源流 (55)

金志军 赵柳英·从“我班有九口留学生”谈汉语物量词的教学
..... (63)

王幼敏·日本人学汉语发音错误分析及思考 (69)

张春芳·韩国人学习汉语普通话发音难点浅谈 (82)

朱晓琳·法语国家学生汉语发音问题初探 (89)

吴仁甫·汉字的识记 (94)

张永奋·谈谈对外汉语的书写教学 (104)

吴玉如·积极利用语言环境 提高学生汉语水平 (112)

华霄颖·论情景练习 (120)

子 亮 勇 毅·功能情景教学谈 (126)

史世庆·谈“视、听、说”课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133)

史舒薇·汉语会话教学的四个阶段 (147)

肖 路·从儿童习得第一语言与成人学习第二语言的对比中

谈对外汉语教学 (156)

吴碧莲·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再论海外华人子弟及外国

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

——兼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设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潘文国

一、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间的疏远性

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的关系,通常强调的是两者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如说语言研究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是语言教学的指导;而语言教学为语言研究提供课题,是语言理论的实践基地,等等。这种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当前汉语研究与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觉得还应强调两者关系的另一面,即疏远性。

第一,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应当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语言理论研究方面来说,它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不能围着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转。有的语言理论的意义一时半时看不出来,也许要过许多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逝世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但他的理论的价值直到现在,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欣赏,他的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直至本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才分别有了英、俄、汉语的全译本,即是明证。另一方面,语言教学可以而且看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滞后性,不能赶语言理论研究的浪头。今天刮

北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赶快作出调整;明天刮西风,教学又马上跟着变。在语言理论研究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语言教学工作者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风转;而有远见的语言理论家也并不要求自己的理论能马上运用于教学实践。在转换生成语言学如日中天、许多人都热衷于将之应用于语言教学的时候,只有乔姆斯基本人说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教学,并且说,作为教学语法,传统语法是很好的^①。因此,不论是搞理论研究的还是搞教学实践的都必须注意保持语言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这一距离,最要不得的便是硬把两者扭在一起,搞理论的希望马上付之于教学实践,搞教学的则不断地企图跟上研究的发展。而这正是我国几十年来的语言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所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外的语法研究,自从上世纪末英国的斯威特以来,非常强调理论语法(或专家语法)与教学语法的区别。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而我国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就有将两者混淆起来的趋势,后来的研究者中只有黎锦熙注意到了两者的区别^②。建国以后两者的相混更是变本加厉,几次语法大讨论、特别是八十年代初导致“试用提要”出台的那一次,实际上是语言理论研究对语言教学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在基础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的思想。实践恐怕已经证明,从“暂拟体系”急急忙忙过渡到“试用提要”,是弊大于利。反观国际上,美国是本世纪来语言理论变革最风起云涌的国家,但它在教学语法的使用上却是惊人的滞后,影响遍布全世界的托福考试,其使用的语法体系还是最“传统”的传统语法。英语的学校语法(即所谓“传统语法”)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到现在已有了两百多年,在教学上至今还看不出有什么要更改的趋势,其“滞后性”可谓强矣;英语的语法大家,从发动语法革新的斯威特,到叶斯柏森、克鲁辛加、寇姆、夸克,没有人怀疑他们的语法大家的地位和贡献,但他们的体系就是取代不了传统语法。从上个世纪末以后,语言学界对传统语法的攻击可说不遗余力,但

传统语法就是攻而不倒,这充分说明了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可以保持距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二、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的目的不一定相同,不能要求两者时时统一起来。语言研究的最根本目的是探索语言(人类语言总体与各别语言)的本质,而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又有其不同的对象和目的。语言教学也是语言研究的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全部。许多情况下,语言研究本来就不是以语言教学作为目标的,如上引的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又如,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在调查不为人知的印第安人等的语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对语言调查很有用处,但不一定适合于语言教学。至于别的语言学流派,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各有其研究目的,恐怕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教学,因此其个别结论和个别方法也许能用于教学,但其整个理论不能直接用之于教学。只有传统语法,从它两千年前在希腊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它的目的就在于如何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某种已知的语言教会给不懂它的人(包括本族儿童、外族人、外国人等)。语言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语言教学是已知知识的传授,前者要求有独创,后者要求有公认。由于目标不同,因而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在指导原则上也各不相同。在语言研究方法上,本世纪经历了从“规定性”到“描写性”到“解释性”的变化。而在语言教学上,却始终只能坚持一条:“规定性”,即书上的说法就是规则,教师的讲解就是法律。试图把诸如“描写性”的原则运用到教学上,那只会造成灾难。

我们强调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的距离,是为了说明两个观点。第一、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是两种性质不完全相同的工作,需要从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努力。语言教学工作者不要对理论工作者抱过多过高的期望,而理论工作者也不要对教学实践者过多地指手划脚,更不要把自己的研究立足于如何直接为教学服务。这样,两方

面才能互相从对方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放开手脚,在各自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就目前而言,语言教学者尽可以放心地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从事教学方法的探索,不必担心在“理论”上如何“落后”而感到心虚;理论研究者也不必老想到怎样马上用之于教学,而满足于对现有体系的枝枝节节的修改。我认为,只有双方真正得到了解放,各自的研究才能作出真正的成绩,而本文开头说的两者的积极关系,即理论研究作为语言教学的指导、语言教学为理论研究提供基地,也才可能真正实现。

二、当前语言研究的动向

上面我们强调了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的距离,但不是说语言教学工作可以对理论界的动向漠不关心。我国当前的语言理论研究、特别是汉语理论研究,很可能处在一个突破的前夜。它在目前还不会全面影响到汉语的教学,但由于我国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本身不成熟,新变动对未来教学的潜在影响却不可低估。作为语言教学工作者,一方面要容许理论工作者背离目前的“正统”路线作一些探索,不要因为其与教学现状相去较远而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又要密切注意理论界的动向,分析它对语言教学可能具有的潜在意义和影响。

当前语言研究的动向,国际与国内不同,外语(如英语)与汉语不同。国际上的主要潮流也许可以说是“共性”,而国内的主导方向却更可能是“个性”。这与两者的历史有关。国际上,执世界语言研究牛耳的是英语。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英语的语言研究,尤其是传统语法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而本世纪以来的每一次英语语言学新理论出来,都能波及各国各种语言的研究。这就很容易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相信,他们可以在英语基础上进行全人类共同的语言规律研究。而在国内,八十年代初的析句方法讨论,

原意是想跟随国外的潮流,对传统语法进行抨击,不料很快演变为对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反思”,其激烈者对百年来的语法研究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要求从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去寻“根”。这一种激烈的意见赞成的人可能不多,但其形成的冲击是巨大的,《马氏文通》以来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可说又一次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失败,导致了对文字改革方向、特别是汉语拼音化道路的“反思”,从而引发了“汉字与汉语相适应”的相关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最近几年,在对百年来的汉语研究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很多人强调要改变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为重新建立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字本位”理论等^③。这一切,导致和酝酿着汉语研究的一场变革,其标志就是国务院学位办、原国家教委在今年对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汉语言文字学”这一新专业的设立。当然,目录修订不是针对某一学科的,但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前一阶段该学科研究的总结,而对以后的研究有着导向作用。从学科编号上来看,“汉语言文字学”以原来的“现代汉语”专业为主,但涵盖了原先的“现代汉语”、“汉语史”和“汉语文字学”三个专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反映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对这一学科的新认识,它预示着我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教学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语言文字观的新发展

这次专业目录的调整,有人可能只看作是相关专业的合并,以扩大将来招收的研究生的知识面,实际上其意义不尽在此。扩大研究生的知识范围,培养“通才”型人才,这在前几年早就提出来了,但以学科调整的方式,把某一学科人才的知识结构用类似于“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意义仍非同小可。“合”有两种:“粘合”和“化合”。粘合是随意的、表面的、暂时的,其结果很可能是貌合神离;化合却是有机的、内在的、深刻的,它基于对几个有关部分的内

在关系的深刻的认识,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可随意分割的新的整体。“汉语言文字学”就是这样一个“化合”的新专业。其结构关系也很明确,是一个以现代汉语为底座、以古代汉语和汉语言文字学为两翼的稳固的三角。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汉语学者,不仅要有现代汉语的知识,还应该有古代汉语和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以前谈“通才”,对这样一种知识结构还只是一种“期望”的话,随着新目录的施行,这就成了一种“必须”,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汉语研究的人都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

这一新的定位体现了我们在语言观、特别是汉语观上的两个新的发展,是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新的贡献,也是对几十年来语言研究上某种偏差的一个纠正。

第一是古今汉语在一定程度上的打通。

这一打通当然不是古今汉语浑然一气,互不区分。但这几十年的主要倾向不在其“混”而在其分。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里,由于主要受前苏联的影响(当然也有西方的影响),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语言文学疆界划然是不用说的了,甚至在语言内部,搞古汉语的与搞现代汉语的互不往来,甚至在现代汉语内部,搞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都各自划一块地盘,互不通气。这对于某一具体领域研究的深入也许是有好处的,但其结果往往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囿于眼前的一小块,不见全局性的东西。语言本身是一个整体,对它进行横向上的分块和纵向上的分段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但如果把分工变成成家,那就会使分工的意义走向反面;而对每一个研究者来,如果其知识结构只局限于所从事研究的一小块领地,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因此这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强调要在某种程度上打通古今汉语的研究,吕叔湘先生甚至提出过,大学中文系可以只设一门语言课程,叫作汉语通论,把汉语史、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学的内容都放在里面一起讲^④。我们前几年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吹宏观语言学,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原来的做法当然也有理论上的根据,这就是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 and 历时语言学的区分。这一区分自有它的意义,特别对于现代描写语言学的建立具有奠基的功劳。但任何真理性的东西强调得过分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事实上共时和历时不是可以划得截然清楚的,特别是对于汉语这样一种历史继承性特别强的语言来说,完全割断历史,现代汉语也无法真正研究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是搞对比研究的,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强调对比研究属于共时的研究,只有比较研究才属于历时研究,但我发现对比研究也往往必须考虑到历时的因素,例如汉英虚词功能的不同,不联系两种语言的历史就说不清楚。

第二是充分考虑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

西方从柏拉图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传统一直把文字看作是符号的符号,这一植根于西方表音文字体系的文字观本世纪以来对汉语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在这基础上推行的历时长久、波澜壮阔的汉语拼音化运动,使得汉字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讨论汉语的特点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很少有人敢于正视,更不要说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反作用。近十几年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字在语言、特别是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应该重新认识,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字本位”的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索绪尔承认,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而“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⑤。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如果综合考虑到语言和文字两个因素,那迄今为止的“普通语言学”可说只是表音文字的语言和语言学,而表意文字的语言的语言学的建立将有待于汉语语言学者的努力,这将是汉语对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二十一世纪汉语研究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研究,并不是对迄今为止的语言学理论的否定,而是对之的有力补充,这就好

像非欧几何学之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条公理——第五公理的修正为新几何学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语言学的新突破也可能从重新评价汉字的意义和作用开始。在这个时候,新设立的专业将汉语文字学并入了汉语语言学,这是意味深长的。

2. 语言文字研究的新要求

语言观的变化必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如果说,以表意文字为基础的语言学是二十一世纪汉语研究的主攻方向的话,那么,汉语的研究方法也必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我们将要求研究人才的知识结构不再是今天这样的“单打一”型,即搞古汉语的搞古汉语,搞现代汉语的搞现代汉语,搞文字的搞文字,搞语言学理论的搞语言学理论,而必须是综合型的,即古今汉语、文字语言、理论实践,都能有所涉及。“汉语言文字学”新专业的设立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如果今后的硕士生、博士生都能按照这样的知识结构来发现、来培养的话,我们的语言研究人才就将完全是一个新的面貌。

当然还有外语的问题。这是各个专业都需要的,但对语言学研究恐怕更加迫切。当前国内凡五十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汉语研究者,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即国外的研究只能看第二手材料,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观察问题的视野。本来,普通语言学就是对比语言学,如果没有对外语和外国语言理论的借鉴,真正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汉语语言学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前几年提出的宏观语言学主张四个“打通”:语言内部各层面(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的打通,古今汉语的打通,语言与文化的打通,中外语言研究的打通。我们认为这可以成为对下个世纪汉语研究人才的一种要求。

在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是确立汉语的本体观,也就是说,在关涉到汉语的问题上,不管哪一种研究,都要立足于汉语。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今年年初,我们在一篇文章^⑥中指出,我们现在的汉外(主要指汉英)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甚至是汉语自

身的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英语的。因此,我们主张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换一副观察问题的眼光。

在立足汉语的研究上,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整个汉语组织结构中的意义和作用。语言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如语音(音韵)、词汇、语法、修辞等,要在充分考虑到汉字这个因素的基础上展开。这也就是“字本位”的意思。“字本位”思想的提出者是赵元任先生,近年来,徐通锵先生作了比较多的工作,他的一本以字本位为基础的汉语语言论专著即将出版。我自己现在也承担着一个名为“‘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的方法论”的国家教委九五规划课题,希望在这方面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语言教学琐议

我们在前面强调,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各自应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语言研究不应以语言教学为唯一鹄的,语言教学也不应随着语言研究的风向转。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能不注意语言研究的变化,特别是新的语言观的建立对语言教学理论和语言教学法的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一研究能够与语言教学自身规律的研究、与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语言教学上的得失结合起来的话。

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后,兴学校,废科举,逐渐形成了我国语文教学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旧式私塾教育,一种是西方式的新式学校教育。多少年以来,人们对前者可说是全盘否定,对后者则视作当然,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总体来看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旧式教育真的一无是处,新的教学法真的无可非议吗?站在世纪之交重新回眸,使我们为之有了比较冷静的新认识。张志公先生晚年致力于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发现传统的语文教育方法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有不少可取之处^⑦;无独有偶,邓云乡先生

研究清代八股文,发现以前认为一无可取的八股文教育也有不少科学的内核^⑧。另一方面,在全面推行学校教育以后,中国的语文教育质量在不断下降,至少是,从新式学校学语文的人中,没有出过什么大师一级的人物,可以同旧式私塾薰陶出来的鲁迅、王国维等媲美。其中原因自然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但语文教学方法确实不可小看。

从某种角度去看,本世纪以来的语文教育方法也是引进的,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的基础上、符合西方语言的学习规律的;这套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汉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新的语言理论观照下,我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之所以有可取之处,因为它用的是符合汉语特点的“字本位”的教学方法,读书从识字起,作文从对对子着手,从对联过渡到八股文,音韵、语法、修辞等知识是在不经意中掌握的;而新式学校在语文教育上用的是西方语言“词本位”的学习方法,单词表、词汇量是必备之物(尤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作文则从造句始,经写话过渡到通篇,语法等则作为相关的语言“知识”灌输给学生,理论与实际常常脱节。这里我们无意对两种教学法作全面评价,但这两种明显不同的教学方法确实发人深省。

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对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是个有力的促进(举例来说,没有外国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还不会意识到或不肯承认汉语的现行语法体系是那样的弱不禁风、缺乏说服力)。对外汉语教学自身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是更多地模仿其他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教学方法,以词为基础,对汉字不够重视,甚至还发生过要不要学汉字、什么时候学汉字等的争论。后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外语教学的东西。就我所注意到的,最重要的进展有两次。一次是1990年前后,一些教材的编写使用了中国小学生在识字基础上“组词”、“扩词”的内容;另一次是近几年,汉字教学越来越受重视,汉字的结构、部件等